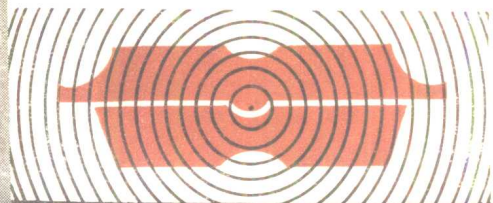


普通语言学纲要

[苏]兹维金采夫著



商务印书馆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2

普通语言学纲要
〔苏〕兹维金采夫著
伍铁平、马福聚、汤庭国等译
王超尘、信德麟、黄树南、伍铁平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3¹/₄印张 269千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300册

统一书号：9017·984 定价：1.35元

目 录

译者序言	3
前言	17
一 语 言	21
1. 语言符号性的理论	27
2. 语言中的符号性要素	58
3. 语言的结构性质	71
二 方 法	95
1. 苏联语言学中的方法问题	100
2. 语言学中的方法论基础和语言学所特有的方法 之间的相互关系	108
3. 数理语言学?	134
三 语言的发展	172
1. 语言规律	172
2. 语言的一般规律和个别规律	183
3. 什么是语言的发展	194
4. 语言的功能和语言的发展	201
四 语言和历史	219
1. 语言的接触	222
2. 语言的混合和融合	237
3. 语言和文化	269
4. 语言和社会	282

5. 人民的历史和语言的发展规律	300
五 语言和思维	314
1. 语言和思维的相互关系	315
2. 语言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323
3. 概念和词汇意义	366
4. 逻辑范畴和语法范畴	384
5. 判断和句子	398

译者序言

我国从 1956 年出版了布达哥夫的《语言学概论》中译本以后，没有再出版过苏联的普通语言学著作。为了了解苏联语言学理论 1956 年以后的发展情况，我们翻译了兹维金采夫 1962 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纲要》，它部分地反映了苏联普通语言学 1956 年以后的新进展，可为我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但是，应该指出，本书除讨论了许多学术问题外，有几处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本来斯大林自己在这本小册子中一开头就声明了他不是语言学家，因此，对其中的许多学术问题完全是可以进行讨论的。但是，从兹维金采夫的这本书的个别部分可以看出，苏联学者有时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今天的说法跟过去的说法有时前后矛盾。同一语言现象，昨天用来论证斯大林的观点，今天却用来反驳斯大林，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戒的。下面，我们以语言融合学说为例略加分析，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

关于语言融合的问题，兹维金采夫说斯大林把极为复杂的语言融合问题简单化了。他认为对语言融合的过程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语言的每个平面进行分析所涉及的是语言的各个方面（语音、语法与词汇系统）的可渗透性问题”（第 221 页）^①；从全面的角度进行分析，“所遇到的则是语言

^① 指《普通语言学纲要》俄文版的页码，下同。

融合(或译‘混合’,兹维金采夫没有区分这两个概念。——引者)(语言的相互影响)的各种类型问题”(第 221 页)。从后一角度分析,兹维金采夫认为除一种语言完全取代另一种语言的情形外,语言融合的过程至少还可以分出五种类型(第 221—222 页)。

在我们具体分析兹维金采夫所列出的五种类型以前,首先要指出,斯大林说的明明是:“两种语言的融合,其结果通常有一种成为胜利者”^①。可见,斯大林并没有说只有一种类型。

其次,斯大林说的是“两种语言的融合,其结果通常有一种成为胜利者,而另一种则会衰亡”^②。“融合”则指一种过程,不仅包括过程的开端与结果,而且包括过程进行的中间阶段。斯大林说:“语言的融合是通过争取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的斗争进行”的^③,可见,在这融合的过程中,即在争取语言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一胜一败的结果还没有出现。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即融合过程还没有达到最终一胜一败的结果便中断。如朝鲜语并没有被日语同化,尽管它们之间曾经发生过融合的现象。因此,兹维金采夫下面的这句话“在研究语言融合的过程时……除开一种语言完全排挤掉另一种语言的情形外,还可以至少分出五种典型的情况”(第 221—222 页)是不恰当的。一种语言排挤掉另一种语言是融合的结果,而他想分出来的却是五种过程。试问怎能用过程的类型来与结果比较呢?

再次,斯大林所说的第一个公式指的仅是民族语言的融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载人民出版社版《斯大林文选》下卷第 556 页。

② 引文中的仿宋体字是我们标出的。

③ 同上书,第 557 页。

合。因为他说：“斯大林在他的小册子中论及语言融合问题的那个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时代，这时剥削阶级是世界上的统治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国家的区别巩固着民族的孤立和民族的互不信任，民族平等还不存在，……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摆在日程上的不是各种语言的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①。可见，既然他处处说的是民族，其语言当然是民族语言。对民族语言以前各阶段的语言（氏族、部落、部族语言）融合的情形他是没有加以考虑的。兹维金采夫所举的有些例子并非民族语言，所以不能用来反驳斯大林说的民族语言的融合。

最后，要弄清楚斯大林论及语言融合问题的背景。斯大林的话是针对马尔的语言融合论而发的。马尔提出了主观的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语言融合论来跟历史比较法的语言分化论相对立。他认为语言形成不可能通过分化的道路；世界上的一切语言都是由四要素（сал, бер, йон, рош）这样或那样融合起来组成的；这样形成的语言再通过融合的道路又形成新的语言，因此，世界上不存在非融合的语言；相近的语言就是由融合过程中有共同的组成成分造成的；只有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语言，产生语言的新的质变。马尔说：“没有融合……就不可能产生任何语言，更不用说语言的进一步发展”^②。马尔甚至认为：“现在所形成的有声语言一开始就不可能不是融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载人民出版社版《斯大林文选》第 557—558 页，仿宋体字是我们标出的。

^② 《马尔选集》，俄文版，第 2 卷，第 399 页。

合的(指由四要素融合成的——引者),融合以前没有也不可能有有声言语”。^①马尔认为“融合不是反常现象,而是说明语言种类的起源和所谓(语言)渊源亲属的起源的正常方法”^②。在马尔的融合理论里“任何语言中的任何音都可以转化为任何语言中的任何音”^③。于是马尔得出结论:“印欧语、闪语、突厥语、蒙古语、乌戈尔-芬兰语、汉语、阿富汗语、大洋洲各语言、澳大利亚语、美洲各语言之间……都无疑有亲属关系”^④。马尔不象历史比较法那样,将俄语 два,梵语 duva,希腊语 dyo,古波斯语 duva,英语 two,德语 zwei(二)解释为起源于共同的词根,而认为起因于这些语言都是由共同的四要素融合成的。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马尔的融合有时并不是语言之间的融合,而是指音的融合,否则他所说的“没有融合就不可能产生任何语言”这句话就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世界上的第一个语言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总之,马尔的融合理论简直成了他的法宝,马尔既用它来解释语言的起源与发展,又用它来解释语言的亲属关系和谱系分类,还用它来解释词汇和语音的变化,以及语言的相互影响。马尔自己也说:“雅弗语言学(指马尔的语言学说——引者)……是建立在研究融合的语言种类的基础上的”^⑤。

① 《马尔选集》,俄文版,第2卷,第65页。

② 同上,第1卷,第150页。

③ 见 Ю.Д.Дешериев:《马尔关于语言融合的错误原理批判》,载《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加以歪曲》,第2集,第311页,莫斯科,1952。

④ 《马尔选集》,第1卷,第411页。

⑤ 同上,第1卷,第98页。

由此可见，斯大林所反对的语言融合(скрещивание)是有其特定涵义的，是专指马尔的语言融合理论而言的，并不是一切语言接触(контакты языков)都可以叫做语言融合。然而兹维金采夫显然歪曲了斯大林的原意，他将融合与语言接触(它是比语言融合要广得多的概念)完全混为一谈。因此，他所列举的五种类型中有些根本不属语言融合的范畴。例如，兹维金采夫列举的第一种“融合过程的类型”是：语言相互影响，但一个语言并未战胜另一个语言，而是仍然各自独立发展。如阿拉伯语对波斯语有很大影响，但这两个语言现在都继续存在(第 222 页)。

既然两种语言只是相互有些影响，并没有发生“融合”，那么，斯大林所说的融合这个概念当然不能包括上述情形，因此，说斯大林没有考虑这种类型的融合，这种批评是文不对题的。

兹维金采夫列举的第二种类型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类型。在叙述这一所谓“类型”的一节文字中他只不过叙述了以下两个问题：(1)他说语言融合过程中，不管是否一个语言战胜另一个语言，融合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象斯大林所说的“词汇有所丰富”，而可能是极大程度地影响词汇(第 223 页)。他以阿尔巴尼亚语为例，指出在阿语的 5140 个词中，只有 430 个是本族语词，其他全是外来语。朝鲜语中百分之七十五是汉语借词(第 223 页)。这里我们姑不论例证本身是否属实，只须指出，兹维金采夫显然将词汇借用与语言融合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兹维金采夫赞同地引证了阿巴耶夫的话：“底层和借用都是一个(语言)系统的成分渗透进另一个系统。但

是,在发生底层现象时,这种渗透要深入、密切、显著得多。它可能涉及语言的一切结构方面,而借用则通常只涉及几类词汇。渗透的深入程度与密切程度使底层联系接近于建立于亲属关系之上的联系。底层与亲属关系都是以民族起源上的联系为前提,而借用则不同,与民族起源毫无关系”(第215页)。阿巴耶夫还指出,底层现象出现在有双语现象发生的时候,而借用则完全不需要有什么双语现象作为前提。^①可见,将一个语言中有很多借词就说成那个语言与其他语言融合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只有语言间有接触才能产生语言融合现象。而借用则不然,它可以通过转借的方法借自远隔重洋、毫无接触的语言。俄语 шоколад(巧克力)是借词,但不是直接借自墨西哥的阿兹特克语,而是通过波-德-英语的媒介。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俄语中有 шоколад 这个借词,就说俄语跟阿兹特克语间有融合关系。如果有借词关系就是融合,那么,英语的借词来自法语、德语、荷兰语、凯尔特语、北欧各语言、意大利、西班牙、拉丁、希腊语及亚洲一些语言等上百种语言(见斯基特编:《英语词源词典》),难道能说英语与这上百种语言都发生了融合吗?可见,说有借词就有语言融合,那就必然会得出跟马尔相同的荒谬结论(尽管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世界上的一切语言都是融合的,没有非融合的语言。

由此可见,兹维金采夫用有些语言中外来语超过半数的事实来批评斯大林所说的在语言融合时,战胜语言从战败语

^① 见 В. И. Абаев: «论语言底层», 载 «Доклад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языкознания», 第9卷, 1956, 第59—60页。

言吸收某些词汇丰富自己^①，又是牛唇不对马嘴。

兹维金采夫在所谓第二种类型这一节中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说法语尽管在十四世纪时在英国已被英语取代，但由于法语在法国本土仍继续存在，英国在文化上仍然受法国很大影响，所以十四世纪以后英语中的法语借词的数量不少于十四世纪以前(第 223—225 页)。兹维金采夫企图以此证明，斯大林所说的语言融合时一个语言被战败，“逐渐衰亡”是不正确的。

显然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十四世纪以前，法语给予英语的影响是属于语言融合中的表层现象。十四世纪以前法语和英语在英国本土经历了长达三世纪之久的融合过程(从 1066 年诺曼人入侵起，算到 1362 年英国议会开始改用英语时止)(斯大林指出语言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历数百年之久)。最终法语在英国本土上被战败，法语只留下一些表层在英语中，法语作为一个独立语言在英国已“衰亡”。至于法语在法国本土继续生存，在与英语接触的过程中，继续向英语输送一些借词，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与斯大林上面所说的毫不相干。这时，词汇的借用已不属表层现象。假若十一世纪入侵英国的诺曼人的祖国不在邻近英国的法国，而在欧洲的东部，此后与英国再没有接触，那么，就不可能再发生十四世纪以后英语之继续大量借入法语词，因为法语在英国本土

^① 诚然，语言融合时词汇借用的比例也可能很高，而不仅限于“吸收一些词”。但是这儿的关键是不能因为借词的比例很高，就说发生了语言的融合。例如朝语尽管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汉语借词，但它并未同汉语融合。

已经逝去。十四世纪以后法语给予英语的影响也同样可以由其他邻近英语的语言产生。而且十四世纪以后由于英法两个邻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不仅英语继续从法语吸收词汇，法语也在更大程度上从英语吸收词汇。现在的法国语言学家正在惊呼保卫法语的纯洁性，成立了“保卫法语”的组织，号召排斥不必要的英语（包括美国英语）借词。凡此种种都说明将十四世纪前法语与英语的融合（法语在英语中所留下的表层）跟十四世纪以后法语给予英语的影响混为一谈是完全不正确的，以此批评斯大林所说的一个语言战败，逐渐衰亡，又是文不对题。

兹维金采夫列举的融合的第三种类型是一种语言受另一种语言的影响，语言结构从复杂变为简单。所列举的例子是古英语受古丹麦语的影响，格变系统消失（第225—228页）。然而兹维金采夫又说并没有任何结构特征从一种语言渗透到另一种语言，因此，“甚至不能看作真正意义上的融合”（第225页）。既然如此，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把它作为融合的一种新类型，用来批评斯大林呢？

兹维金采夫列举的融合的第四种类型是语言联盟（Sprachbund），这就更离奇了。当斯大林谈到语言的融合问题时，是指两个（或几个）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的语言由于相互接触而产生的相互影响，而新语言学派（Neolinguistics）谈到语言联盟时则不然，他们所理解的语言（而这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大前提，大前提不一样，就不可能将融合与语言联盟进行比较）根本不同于传统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新语言学派的首领之一皮萨尼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连接个人言语行为

的许多同语线所构成的体系”。^① 由于同语线指的是连接某种分布各地的共同语言特征的界线,所以根据这个定义,各语言之间是没有绝对的界线的,语言不再构成一个它所特有的完整的结构体系。新语言学派的另一首领朋芳德说过:“不仅在同一语族的各语言(如法语、普罗旺斯语、意大利语等)间没有实际的界限或壁垒,就是在同一语系的不同语言(如法语与德语或德语与捷克语)间,甚至在不同语系的各语言(如俄语与芬兰语)间都没有实际的界限或壁垒。在这方面新语言学派在反对青年语法学派关于语言的完整性的概念的斗争中早就想到了布拉格学派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语言联盟的原则”^②。特鲁别茨柯依曾著文专门论及语言联盟问题,他认为印欧语形成的区域位于芬兰-乌戈尔语与闪语形成区域之间,一个语系的语言之逐渐向另一语系过渡,跟施米特(Schmidt)在印欧语系的各语言之间的关系中所发现的波浪形状的过渡,是一模一样的(第210页)。正是从上述语言间没有绝对界线,语言不过是许多同语线的组合,某些同语线不仅可以越过邻近的亲属语言的界线,而且可以越过非亲属语言的界限,各语言相互间不断地象波浪似地过渡的观点出发,新语言学派得出结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融合成的,融合就是语言变化的原因。新语言学派的首领皮萨尼说过:语言中的任何新形式都是由于两个先前分别存在的语言形式融合成的,因此,一般说来每个语言变化都根源于语言的

① 转引自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第8页。

② 见 G.Bonfante:《The Neolinguistic Position》,《Language》, vol. 23, 1947, 第344—375页。

融合^①。朋芳德甚至认为法语不过是拉丁语+日耳曼语(法兰克语)的融合,西班牙语不过是拉丁语+阿拉伯语的融合,保加利亚语=斯拉夫语+希腊语,俄语=斯拉夫语+芬兰-乌戈尔语^②。

跟新语言学派观点相近的还有以吉叶荣为代表的地理语言学派。吉叶荣也反对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它不考虑语言发展的具体地理与历史因素;反对历史比较法的语音规律。吉叶荣认为“语言融合是语言形成中的基本因素”。马尔的语言融合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吉叶荣、新语言学派、舒哈特这些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反对派的影响。因此,兹维金采夫既要反对马尔,又要部分采用上述历史比较语言学反对派的观点,只能造成自己观点上的矛盾与混乱。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语言学派所理解的语言联盟是建立在另一种语言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根据这种理论,一切语言都是融合的,语言只是许多同语线的组合,不存在独立的语言结构体系,因此,也就谈不上两个独立语言体系的接触,谈不上一胜一败的问题。由此可见,象兹维金采夫那样将语言联盟只看作语言融合的一种类型,用它来指责斯大林,说他只指出一种语言融合(一胜一败),是将两个根本不能进行比较的现象硬拉在一起了。

在某些语言学家的著述中,语言联盟指的是不同语言在

① В.Пизани 等:《Общее 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论文集),ИЛ, М. 1956,第 112—113 页。

② 见 G. Bonfante:《The Neolinguistic Position》,《Language》,vol. 23,1947,第 344—375 页。

一个共同区域由于长期并存，产生了语音、语法结构类型上的相近^①。在这些语言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的接触。例如，在太平洋区域，许多根本不同语系、语族的语言因地理关系，有许多相近的结构特征，比如，都是声调语言，词的音节数目都很少，词素多半是单音节的，词序都是相对固定的，用词序表达语法关系，“个”、“把”、“条”这类没有词汇意义的量词(所谓“分类后缀”)都比较发达等等。但是，我们只能说这些语言处于语言联盟关系之中^②，而决不能比如说这一地区的汉语跟印尼语或马来亚语发生了融合。可见，语言联盟与语言融合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决不能将语言联盟看作语言融合的一种类型。语言联盟的概念倒是与语言类型比较接近^③。如欧洲许多语言表示肯定语气的语气词都是音节数目极少的词，它们在功能与语义上都极为相近(比较俄语的 да，英语的 yes，德语的 ja，法语的 oui)，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些语言间有融合的关系。

① 关于这一点，萨丕尔在其《语言论》中也早已指出：“类似的重要形态特征往往在一个广大地区里散布于不同的语言”(中译本，第 127 页)，“在一个狭窄的地区里，完全没有关系或关系很远的语言之间会有很突出的语音上的平行”(同上，第 124 页)。

② 赵元任将同一个地区语言结构特征的相近比作生物里的所谓平行进化(parallel evolution)。比如，由于生活的地区和环境相同，原是陆栖的哺乳类动物——鲸——返回水中生活以后，经过长期进化，又具有跟冷血动物——鱼——一样的形状(比如说有尾巴)。又如，蝙蝠也是哺乳类动物，可是，由于它跟鸟一样都是生活在空中，所以尽管它跟鸟所属纲目完全不同，却具有鸟的形状(比如有翅膀)。见《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第 63—64 页。

③ 比较《布拉格语言学会语言学词典》(1960，第 16 页)便是完全从类型角度给“语言联盟”下定义的：“语言联盟是指在句法、形态、音位结构上所具有的明显的相似”。同语言联盟之与语言类型接近相反，融合则与民族和种族起源有密切联系。从这里更可以看出，无论如何不能将语言联盟看作语言融合的一种类型。

在这里不妨提及戈尔农 (Б. В. Горнунг) 1956 年前在底层问题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在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几个长时期在相邻领域内相互作用的语言(例如巴尔干各国的语言)的历史上，可能发生‘语言联盟’的现象，但是这只是语言相互作用的一种类型，它与民族融合毫无联系或几乎没有联系，因此它与底层现象(融合现象的一种——引者)的研究没有直接关系”^①。

1956 年还承认语言联盟只是语言相互作用的一种类型，六年后却把它说成语言融合的一种类型，并用它来批评斯大林，这是学术服从政治，出尔反尔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兹维金采夫所列举的融合的第五种类型，即所谓混合语(如洋泾浜英语)更站不住脚。首先兹维金采夫自己也承认这种所谓混合语根本没有资格叫做语言。它们充其量也只能叫做一种社会习惯语(жаргоны)，它们也不是两种语言的混合，而是一种不合语法的语言。因此，根本不应该把这种混合语看作语言融合的第五种类型。因为斯大林说的是语言的融合，既然混合语不是语言，大前提不存在了，又怎么还能用它来批评斯大林的语言融合见解呢？

1952 年伯恩斯坦写过一篇文章《论语言融合问题》，他反驳了有人想用混合语的例子批评斯大林关于一胜一败的观点的企图。他指出，混合语尽管的确不同于发生混合的两个语言，但是，这种混合语只能叫做社会习惯语，没有资格叫做语言，因此，根本不是象马尔所说产生了一种什么新的质的语

^① «Доклад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ып. IX, 1956, 第 170 页。

言^①。同是一个混合语的事实，十年前用来论证斯大林的观点，十年后却用来批评斯大林的观点，变化未免太快了。

以上所述，是指出兹维金采夫从全面的角度分析语言融合过程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兹维金采夫接着在第 235—248 页又从语言的各个方面分析了语言的融合(混合)，谈到语言的各个方面的可渗透性问题。在这一部分中更可以明显看出兹维金采夫混淆了“语言融合”与“语言相互影响”(或称“语言相互接触”，或“语言相互作用”)两个概念。例如，他在这一部分中谈到俄语中的外来后缀-изм, -ист, -фикация, -аж(第 239 页)。然而须知这些后缀为欧洲许多语言所共有，简直无法说俄语究竟借自哪个语言。试问这时俄语究竟跟哪个语言发生了融合呢？总不能说它跟欧洲所有语言发生融合了吧？语言学家通常把欧洲许多语言共有的这种成分叫做国际成分(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ы)，总不能说俄语与国际语发生融合了吧(因为根本没有国际语这样一种语言)！这些后缀中有一些导源于古代拉丁、希腊语，是后人仿照这些语言的模式造出来的，总不能说现代俄语跟早已逝去的拉丁、希腊语发生了融合吧！兹维金采夫把英语模仿拉丁语广泛运用绝对结构的现象也作为语言融合的一个事例(第 241 页)，其错误与上述情况相同。英语怎能跟一个死去的语言发生融合呢？

总之，不论从全面的角度进行分析，还是从语言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兹维金采夫都显然混淆了语言融合与语言的相互接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① 见《反对在语言学中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加以歪曲》，莫斯科，1952 年，第 301 页。